

她的眼睛，如今仅剩一丝微弱的光感。

她的职业生涯，早在20年前就被医生宣判了“死刑”。

但是，20个春夏秋冬过去了，她仍然坚守在讲台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
医生说：这简直是一个奇迹！听过她故事的人都说：这怎么可能？

她的名字，叫单海莉。在江西省瑞金市壬田镇青龙小学的花名册上，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。

奇迹却并不止于此。

这是单老师上学期所带班的语文成绩单：平均分91.6分，及格率100%，优秀率100%，位列全镇第一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个班的平均分领先于第二名11分之多。青龙小学的校长朱建华说：“壬田镇的老师都知道，单老师从教以来，无论期末考，还是抽考、统考，几乎年年得第一。”

稍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一个老师努把力，或运气好，一两年得第一不足为奇。但20年的漫长教书生涯，什么样的学生，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遇到。竞争对手中，年富力强的老师有之，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之，想干出一番成绩的的老师大有人在，凭什么、通通逊色于一个小女子？

何况，她并非师范科班出身；何况，她是一个双眼视盲的人……

二

眼前的单海莉，面容清秀，皮肤白

皙，一件简单合体的蓝色T恤，一条随意扎就的马尾辫，显得优雅娟静。只是，细看她的眼睛，却像蒙着一层淡淡的薄雾。眼角上，两道暗红的刀疤隐约可见，令人不忍直视。一旁的教导主任说：“还没有正式开学，她本来完全可以待在家里的，但是她却急急地赶来了。”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放假，我总是盼望着早些开学。”单老师接过话题。其时，她刚刚从上海看病归来，包里还装着一大堆的药。她的眼疾，早就转为眼色素变性了，就像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，消耗越多，离熄灭越近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失明。更可怕的是，今年她又患上了严重的胃肠道功能紊乱症。腹部的疼痛与痉挛常常折磨得她彻夜无眠。校长本想让她不再上主课，当老师们的幕后指导，但是单老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
“我舍不得孩子们。”单老师说。

学生在她的心目中分量太重太重。1992年高中毕业后，单海莉做了一名乡村教师。拿起教鞭的第一天，学校安排她去听了一节老教师的课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课堂上竟出现了那样多的错误。错误的读音、字词，还有唱山歌一样的朗读，她的心被揪得生痛。晚上，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从小就梦想着当一名老师，命运眷顾我实现了愿望。我一定要做得比别人更好，一定要对得住讲台下的这些孩子。”

为了教好书，她买光盘、订杂志，到城区向名师请教，回到家里拉来兄弟姐妹当学生试教……从一个字音，一个小小的教学细节，到一堂完整的课堂流

程，她不断地学习、揣摩。她说：“看到孩子们学得开心，我心里比他们还高兴。”

说起来，单老师的眼睛患上恶疾，也是因为孩子。

1994年的一个雨天，单老师发现钟艺同学独自待在教室里，于是匆匆推上自行车，披上雨衣送她回家。由于雨急风大，单老师的眼镜被雨雾模糊，不慎翻下路旁的深水沟，头部狠狠地撞到一

摆在单老师面前的，是无比严峻的考验。看不清学生的样子，她一个一个叫到跟前，摸摸头，拍拍脸，聊聊天，凭着声音和身影记住每一个孩子的特征；望不见孩子举手，她采取轮流发言制，碰到有难度的问题，就让班长帮助点举手的同学回答；板书太慢，她利用课间一笔一画先准备好；无法监考，她把孩子分成两组，单人单桌进行。最难的，还

奇迹，诞生在微光里

□朝 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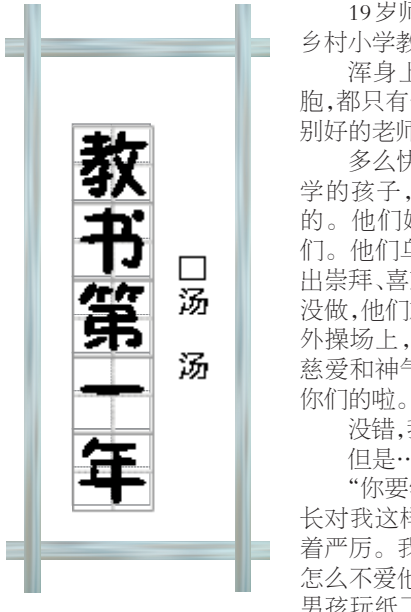
块石头上，眼睛浸满雨水，一阵阵剧烈的疼痛。起先她没有在意，谁知十几天后，视力越来越差，以至于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同为教师的丈夫丁立海赶紧带她到南昌、广州、上海等地求医，确诊为强烈撞击加上雨水浸泡引起的视网膜脱落。又是开刀又是激光，强烈的刺激，令单老师晕倒在手术台上。医生告诫她说：“这种病，如果用眼过度，极易发展为眼色素变性，那就彻底没治了。以后，你绝对不能再从从事教师职业了！”

可是，她怎么能够割舍？
“即使是真的失明，我也要坚持到失明的那一刻！”

是批改作业。鼻尖都凑到了本子上，还是很难看清字迹，别人改十几二十份，她只能改一份。长期的高强度伏案工作，头痛、胸闷、呕吐一一缠上身来，特别是眼睛，时间一长就剧烈疼痛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时间来战胜效率。别人吃饭的时候，她在工作；别人休息的时候，她还在工作。最近几年，实在难以看清的时候，她利用课余时间，叫上成绩好的学生将作业念给她听，握着她的手，在本子上打下一个个大红的勾和叉。

三

在单老师的抽屉里，摆放着一个小



19岁师范学校毕业，欢天喜地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去。

浑身上下，从头到脚，全身每一个细胞，都只有一个想法——我要当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。

多么快乐呀，我遇到的一群刚上小学的孩子，37个，他们是新的，我也是新的。他们好奇地看我，我也好奇地瞅他们。他们乌亮的眼睛毫不吝啬对我传递出崇拜、喜欢和信任的信息。我还什么都没做，他们就愿意把心交付给我了吗？窗外操场上，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，那么慈爱和神气。我暗自发誓，孩子们，我是你们的啦。

没错，我是一心一意要当个好老师的。但是……

“你要学会爱孩子们。”一向温和的校长对我这样说，声调不高，却明明白白透着严厉。我使劲憋着眼泪在心里抗议，我怎么不爱他们？我们亲密得如同伙伴，和男孩玩纸飞机，和女孩跳皮筋，放学后一

起跑到山上摘花，去田野里扯野菜。我甚至能听见自己心里的爱在哗啦啦流淌的声音。如果谁敢欺负我的孩子，我真敢去和他打架，尽管我是这么胆小和怕疼。

班里有女孩离家远，和高年级的几个女生一起住在学校寝室里。有一天她告诉我，她很孤单，夜里睡觉会做噩梦。

“那我陪你睡吧。”

当晚我就睡到了她的床上，寝室里有一股味儿，她们很久才洗一次澡。高年级的女生很惊诧我的到来。女孩挨着我，像挨着自己的妈妈，她显然在收获着很多的羡慕。她睡得可香，后半夜把手和脚都揣到我身上。我陪着她一连睡了大半月。有一天，正在办公室里改作业，觉得头皮痒痒的，用手指一挠，我挠下了一颗肚皮滚圆的虱子……

“我……我是爱他们的。”我冲着校长辩解。

“是吗？看看你今天做的事情。”

那天我做了什么？我们去郊游了，气温高得离谱，每个人都热得要命。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雨，清凉的雨滴多么舒服，别班的老师领着孩子们朝屋檐底下跑去。

我问我的孩子们：“你们想躲雨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他们说。

“我也不想。”

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，我们38个人走在雨里，我们奔跑，蹦跶，还伸长舌头舔雨珠的味道，把坑洼里的雨水踩得四处飞溅，我们快乐地大笑大叫，每个人都是透湿的……

“你是个老师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心里要装着孩子才行呀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但你能光顾着自己开心，随便拿孩子们的身体开玩笑！”校长继续批评。

“我们都很开心，真的……”我虚弱地辩解。

第二天，教室里稀稀拉拉只坐了很少的几个人。我的大半孩子因为发烧来不了了。虽然没有一个家长责怪过我，但我难过得两顿没有吃饭。唉，原来我真的不是个好老师。

接着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区统考。

校长问我，“你觉得你们班能考第几名呢？”

“第一名呀。”

孩子们也这么想，我们的意见总是一致的。考试结束，成绩下来了，校长递给我一张成绩单，那是区统考的成绩和名次。我兴奋地拿过来，第一名不是我们班，第二名也不是，第三名还不是……眼睛一行一行地往下看，一直到最后才看见，是……最后一名？怎么可能？我呆呆地拿着成绩单，泪水滚出来，起先我低声啜泣，后来干脆放声大哭。我是一个多么羞劲的老师。

可是怎么会这样？孩子们明明很优秀的，他们能说流利的普通话，比任何一个年级的孩子都说得好；他们那么热爱上学，没有谁不肯做作业的；上公开课的时候，他们活跃的思维让听课的老师深感吃惊；他们学会阅读了，还能用得不多几个字写出有趣的日记，他们念起课文来，多么有感情……

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很努力了的，我备课总是到很晚，想出各种招数吸引孩子们的注意，上课那么卖力，嗓子哑了也不停歇。班里有四五个孩子总是听不懂，我就一遍一遍给他们讲，讲了一通问他们，懂了吗？他们摇头一脸茫然。我心里又急又无助，背过身去，泪水止不住往外涌。用手把眼泪擦干了，回转身，笑着对他们说，“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们讲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”讲啊讲，觉得差不多了再问一遍，现在懂了吗？还是摇头，我背过身，泪水又漫出眼眶。记得有一回孩子们盯着我大笑，“老师，你看起来像一只花猫。”拿起一个铁皮文具盒一照，泪水粘着粉笔灰，脸上红一道，绿一道，不像花猫像什么？

“是最后一名啊，你要努力啦，哭是没有用的。”校长说。

“我相信你，会成为一个好老师。”校长又说。

我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师？16年前那个夏天我问自己，迷茫又沮丧。



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，更多的时候，它被称作“事业”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老师，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参与者，无论美好还是遗憾，都抹不掉老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。“辛勤的园丁”、“燃烧的蜡烛”、“点灯人”，我们用了那么多的比喻来表达敬意与期望。这敬意给教师带来尊严与使命感，也带来压力、困惑甚至质疑。在今天，很多神圣与美好都面临挑战，但依旧有不变色的纯真与情意在感动着我们。

——编者

教书第一年

□汤 汤

纯真笔记

□倪树根

爱钱钱庆华生前是一位小学教师，经常讲一些学生的趣事给我听，言语之间满是孩子们的纯真和她对孩子们的爱。我鼓励她把些生动而有趣的生活记录下来，于是，退休后的妻子每天写一件事，哪怕在病痛中，她也坚持写一些，或许在这回忆的过程中，她会重新体会自己青春的光彩、浓浓的师生情，而更加幸福、乐观和自信。到去世，她积攒下120则小笔记，整理出这些并不华美、也未见得多么文采斐然的记录呈现给读者，无非是想传达为人师者的情怀，以及多彩而有趣的童心世界。

“犟”孩子

有“叛逆”性格的孩子我见多了，但是脾气这么“犟”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他是我同事班里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不听老师的话，还经常和其他小朋友打架，老师没办法，只好去向家长“告状”，受欺负的小朋友的家也去向他父母告状，把父母气得不行，什么软的、硬的办法都用过了，有时甚至不给他吃饭，把他绑在椅子上打，他就是不讨饶。有一次，被父母毒打一顿之后逃到一家酒店门口，等父母找到他时，已经在台阶上睡着了，父母把他抱回家，他醒来一看自己睡在床上，又爬起来跑到酒店门口，一直待到天亮。第二天他照常来上学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这个孩子以后不知怎样了。

光屁股

我们学校的南面有一条河，叫“南门江”，9岁的儿子很喜欢游泳，起初，是我陪他去的，后来因为我学校里事情忙，让他一个人去游泳。有一天，儿子出去快半天了，天也开始黑下来了，儿子游泳还没有回来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去找他吧，一时又走不开，正好出差在外的爱人回来了，

他急忙忙地跑到南门江河边，只见一个人蹲在河边，正是儿子，叫他上来他也不肯，说：“爸爸，我的衣服、塑料鞋都给别人拿走了，我赤膊回来难为情。”“那你现在好回去了？”“你背我，前面就不会被人看见了。”说得他爸爸哈哈大笑，背着光屁股的儿子回来了。

不聪明的原因

有个小朋友成绩很差，经过家庭访问，才知道妈妈在怀孕时因为营养太好，致使孩子太大生不下来，医生是用产钳把他钳出来的。有时妈妈会对儿子说：“你是用产钳钳出来的，像个头像个橄榄、长茄子。”一次，一道题老师教了多遍他仍然会，老师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会这样笨？！”他一本正经地指着自己的头对老师说：“这个头是用钳子钳出来的，钳的时候聪明脑子流掉了。”

摇钱老师

我们学校有5个姓钱的老师，小朋友为了叫起来方便，把3个女老师按年龄分成大钱、中钱、小钱，男的叫男钱，可还有一个也是中年女老师，再也不好听了，不知哪个小朋友给取了个“摇钱老师”。那个老师责怪小朋友没有礼貌，可小朋友在背后说：“因为她经常摇头呀。”

11岁的女孩

学生杜某，11岁就来月经了，刚巧母亲出差，她以自己的“小小”破了，又不敢告诉父亲，自己的内裤换不够，把母亲的所有内裤都拿出来换，只要有一点点血就换一条，换下后丢在床底下。待母亲回来时因为找不到替换的内裤问女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也是从这个事例意识到：应当及早给学生上生理卫生课。

钱到哪里去了？

还是在劲松小学的时候，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上学了，当时，我是负责全校报纸收订工作的，由我先向学生把订报的钱收起来，然后再去邮局统一订，那个学期一共收了13元多一点。那时我的工资是全镇最高的——50元，这13元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当我要去邮局订报纸时，却发现钱没有了，大概是大女儿先叛变了哥哥，我也猜到是儿子这个调皮鬼干的，一问，果然问出来了。我要他把钱拿出来，他却把我领到操场上去。那时操场四周是用破砖瓦垒起来的围墙，还有一个土坯司令台。他要我背过身去，蒙上眼睛，他才从一个又一个的破墙洞里把钞票掏出来。因为塞的洞洞多了，也有忘记了的，但绝大多数是掏出来了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把钞票塞在墙洞里，他说墙洞里有蛐蛐，把它们堵住了，以后捉起来就容易了。

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！

分床睡

叶某已经五年级了，但还要同爸爸妈妈睡一个被筒。爸爸妈妈劝了好多次都不肯，甚至在爸爸妈妈的床边给她搭一张小床也不肯，她妈妈实在没有办法，找到我说：“钱老师，叶某最听你的话了，请你劝劝她吧！”

我答应了，找来叶某，说：“你长大了，应该同爸爸妈妈分开睡了。”还讲了一些个人睡觉卫生之类的道理，想不到叶某说：“爸爸妈妈这么大，为什么要睡在一起呢？他们为什么不讲卫生呢？”这可把我给问住了，尽管我又讲了一些其他的理由，叶某也答应听钱老师的话，同爸爸妈妈分开睡，但总是那么勉强。后来，叶某还同爸爸妈妈睡一张床的事不知怎么被其他的女同学知道了，她们讥笑叶某是个胆小鬼，是个小毛头。我立即制止了这种讥笑，但是叶某反倒因为被讥笑决心同爸爸妈妈分床睡了。

养鸡

有一年，我们养了几只小鸡，给儿女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大儿子倪卡带着大妹妹倪威去掘蚯蚓，晚上，在爸爸妈妈带领下去马路的电灯光下捕捉蛐蛐，嘻嘻哈哈其乐无穷。两兄妹还捉毛毛虫、螺蛳(挖肉)给小鸡们吃，花样百出，从不厌倦。有时倪威放学一走进寝室，小鸡们就跟在她身后，一边叽

单老师的鞋子脱掉了，也会悄悄地捡起来，为她套在脚上；那些坐在前排的学生，担心单老师被撞伤，总是将她牵着走上讲台。在单老师的公开课上，所有人都惊叹师生之间那份绝对的默契：不需要一句话，单老师只是一个表情，一个动作，孩子们就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她的意思。她伸手在讲台上摸一摸，前排的学生就知道该递上粉笔还是黑板擦。有时单老师的教鞭点错了位置，学生的朗读照样不会乱了顺序。她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镇里和市里的优质课竞赛，回回获得满堂喝彩。

说到孩子，单老师用得最多的词是“感动”。记得有一次，单老师的女儿意外被车撞伤，夫妻俩急着赶回家，忘了布置作业。不曾想放学后，她班上的学生竟然一个不少，全部排着队来到她家里问作业。只要单老师吩咐有事要说，无论多晚，孩子们都会安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她。

关于未来，单老师没有想太多。她说：“我就是喜欢这份职业，热爱这些学生，只要我还能教，就要一直坚持下去。”她的女儿丁露在一所师范大学就读。单老师希望，女儿将来也做一名乡村教师，甚至，可以像她一样嫁个老师。“我和丈夫商量好了，将来等我们还清了债务，经济条件好一些，我们就去资助那些贫困学生。”丁立海望着妻子，微笑着表示赞同。

可是在单海莉夫妇的房间里，一台14吋的电视机，一个高不过50公分的电风扇，一盏40瓦的白炽灯泡，就是他们全部的家用电器。